



歷史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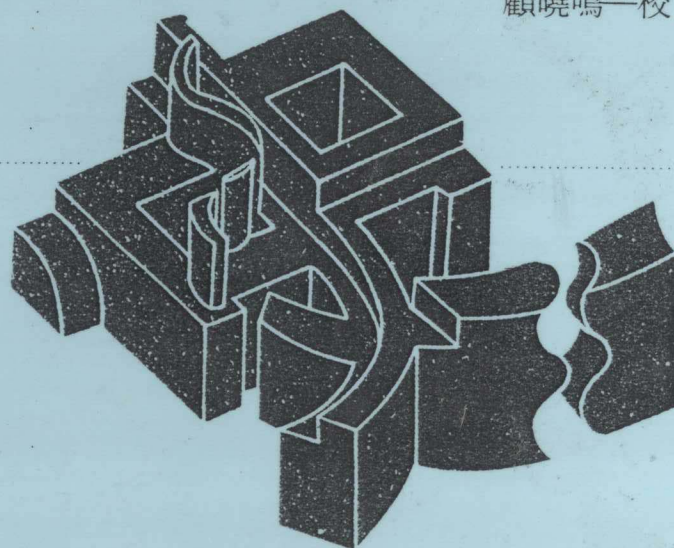
REFLECTIONS ON HISTORY

雅克布·布克哈特—著

Jacob Burckhardt

施忠連—譯

顧曉鳴—校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
系列叢書

35

歷史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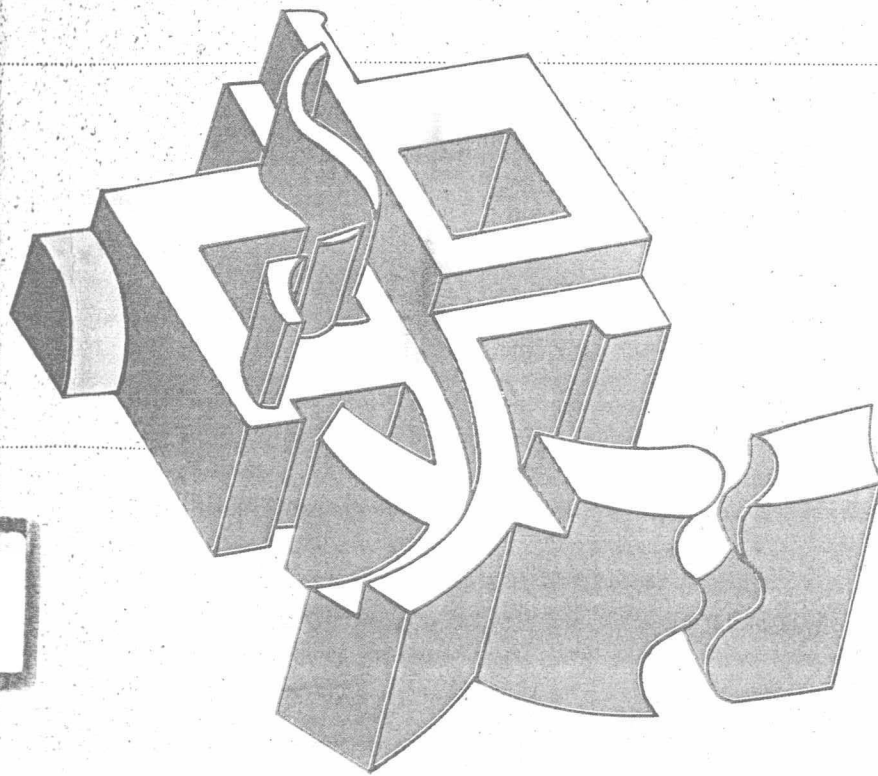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施忠連——譯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是十九世紀最具獨創性的歷史學家和人文學者之一，沒有人比他更能準確地預言現代極權主義國家。《歷史的反思》是布克哈特著作中最有名的一本，它對布克哈特的歷史觀作了最廣泛的論述，書中除了令人驚異的預言之外，作者關於國家、宗教和文化，以及這三種力量之間相互作用的論述，更可以給我們許多啓示，此書是「人類瞭解文明史的指南」。

電腦編號：08735

歷史的反思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施忠連——譯
顧曉鳴——校閱



言公司

121
135



歷史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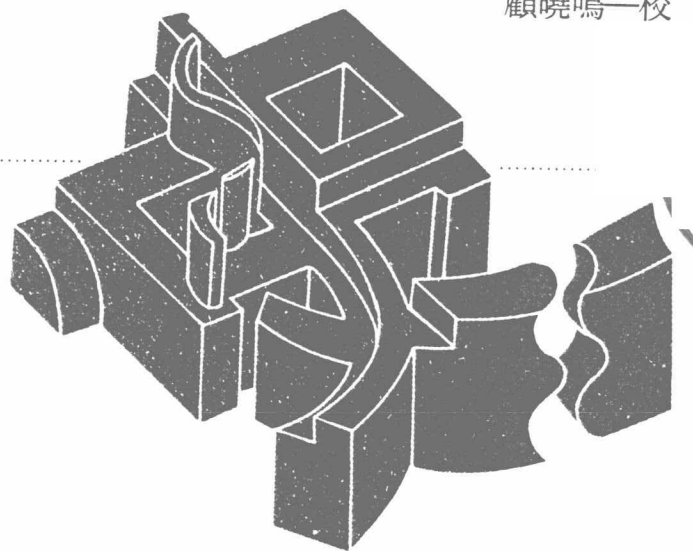
REFLECTIONS ON HISTORY

雅克布·布克哈特—著

Jacob Burckhardt

施忠連—譯

顧曉鳴—校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編審委員

【哲學與宗教學】

◎總召集人——楊國樞

◎召集人——郭博文、楊惠南

◎委員——成中英、李英明、杜維明、沈清松、林正弘、吳光明、
章政通、莊文瑞、傅大為、董芳苑、廖立文、廖仁義、
劉述先、蔡美麗

【藝文】

◎召集人——蔡源煌

◎委員——李祖琛、周玉山、張大春、張漢良、陳傳興、齊隆壬、
龔鵬程、鄭樹森

【史學】

◎召集人——張玉法

◎委員——江金太、李永熾、杜正勝、林毓生、金恆偉、張朋園、
許倬雲、黃俊傑

【語言學】

◎召集人——黃宜純

◎委員——丁邦新

【心理學】

◎召集人——鄭昭明

◎委員——宋文里、黃光國、黃榮村、游乾桂、雷 霆、楊國樞

【教育學】

◎召集人——張春興

◎委員——鍾思嘉

【人類學】

◎召集人——李亦園

◎委員——許木柱、陳文德、張恭啓、黃應貴、黃道琳

【社會學】

◎召集人——文崇一

◎委員——丁庭宇、王杏慶、金耀基、高承恕、孫中興、馬康莊、
陳忠信、張家銘、葉啓政、瞿海源、蕭新煌

【政治學】

◎召集人——胡 佛

◎委員——朱雲漢、吳乃德、周陽山、洪耀德、許津梅、蔡詩萍

【法律學】

◎召集人——王澤鑑

◎委員——李鴻禧、林文雄、楊日然

【經濟學】

◎召集人——于宗先

◎委員——李朝成、夏道平、賴建誠

【傳播學】

◎召集人——徐佳士

◎委員——李金銓

◎總策劃——高信疆

◎執行主編——馬娟娟

◎美術顧問——李 男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亙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裡，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的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的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爲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精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平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爲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需要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久大文化公司和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兩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爲主。爲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和久大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爲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爲「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爲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爲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爲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爲限，可爲翻譯之作，亦可爲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入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久大和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爲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爲數衆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

正在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宣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兩個出版單位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爲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爲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者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爲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

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爲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滯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久大文化公司負責人林國明先生、發行人張英華女士，及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聯合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史學類召集人序

久大及桂冠圖書公司邀請楊國樞先生和高信疆先生策劃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邀約學界同仁共襄盛舉。該叢書分爲哲學宗教、藝文、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傳播學等系列。個人參與史學系列叢書的籌編工作，基本書單由久大及桂冠圖書公司提供，李又寧、張朋園、黃俊傑、杜正勝、張瑞德諸先生亦協助選擇書單。工作進行大體順利，有關書籍將一一陸續出版。史學系列叢書，就內容來說，大概可以分爲十類：(1)歷史發展的趨勢，(2)歷史知識的性質，(3)歷史大事件的影響，(4)史學方法及其方向，(5)歷史思想與史觀，(6)社會史，(7)經濟史，(8)文化史，(9)政治史，(10)心理史。每一類所選擇的書籍，或只一、二種，或多至三、四種以上。

十九世紀，史學在各門學問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許多學科如法律學、經濟學等，都有歷史學派存在。但是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正如布雷薩(Ernst Bresack)所指陳的，許多研究人類現象的學者，都紛紛否認「時間」這項因素的重要性。因此，這門在十九世紀被視爲顯學的學問，到了二十世紀就喪失了它原有的影響力，許多人甚至懷疑學歷史有什

麼用處。史學在學術體系中的地位雖然不如過去，不過，這門學問的本身仍然生生不息、日新又新。

二十世紀史學和過去的不同之處，是史家不再重視歷史的意義和方向，而喜歡探討歷史的知識是否客觀。李克特(Heinrich Riecke)認為歷史知識是個人主觀的建構，不是過去的真實重建。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認為歷史是史家根據自己的想像，對過去的經驗加以重建。柯靈烏(Robin G. Collingwood)則認為史家的任務就是重新體驗歷史人物的思想。在這種情形下，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許多學者，都在討論歷史解釋和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問題。十九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創下的科學的史學，受到廣泛地懷疑。蘭克認為史家只需浸淫於史料中即可重建史實，批評他的人則認為史學研究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必須先清楚地提出問題和假設，沒有理論即不可能有史學。

反對蘭克的人並非不尊重史實，他們認為歷史事件必須放在結構性的脈絡中加以解釋，如此一來，傳統史學所用的純粹敘述的方法便顯得有些不足，而需輔以歷史解釋與理論架構。另一方面，歷史也不再只限於政治史，人類歷史中的各種現象，和它們彼此的關係，都可拿來作為歷史的研究課題。歷史系列叢書所選譯的各書，大體皆為受史學新趨勢影響所寫的書籍。新史學除了許多專書以外，還有許多期刊，包括一九二九年法國史學界所創刊的《年鑑學報》(*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一九二九年英國史學界所創刊的《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和一九七〇年美國史學界所創刊的《科際史學季刊》(*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在新史學的影響下，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經濟史、地方史和社會史陸續成為學術研究的新題材，而這些新興的學問，又逐漸分裂為歷史人口學、農業史、城市史等。人類的心智活動方面，除了傳統的藝術史之外，又增添了科學史、文化史、史學史、思想史、心理史等。歷史研究的題材擴大，加上社會科學的影響，使得史學方法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動，量化研究、比較研究、心理歷史、集體傳記等名詞，也紛紛出現。

史家處理史料、撰寫史書的方法，約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史實派的歷史，通常只用文字史料，對重要的歷史大事作詳細的記錄。第二類是史釋派的歷史，注意各種歷史之間的相關性，主張與社會科學合作。第三類是史觀派的歷史，影響最大的是唯物史觀，強調階級鬥爭和經濟決定論。此不過就大別言之，事實上，無論史學和史學方法，各派互相影響，介於各派之間的史家與著作，所在多有。另一方面，篤學傳統史學和傳統史學方法者，在比例上尤為可觀。

近代以來，學術已經國際化，國際思潮也互相影響。中國由於國勢衰落，無論科技、政治、學術，都大量效習強國，目的無非追求富強，使中國能競生於世界。史學系列叢書是「當代思潮系列叢書」的一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望能將國際知名的歷史著作盡量翻譯、編入，不僅使此新的歷史知識(前所未知者，對自己皆為新)，能灌溉少有開展的中國史學，並以此新的知識，貢獻給依舊貧乏的中國思想。

張玉法

於中央研究院

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序言

9

維也納會議後的第三年，一八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誕生於巴塞爾(Basel)。在世紀之末，也即被稱為大不列顛的世紀，又被稱為自由主義的世紀結束前三年，在一八九七年八月八日，他在那裡逝世。這也就是說，他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理查德·華格納(Richard Wagner)誕生於同一個年代。弗利德里希·根道爾夫(Friedrich Gundolf)說，在歷史主義的時代，那些偉大的德意志歷史學家中，布克哈特最富有想像力，他是「歷史學家中的聖人」①。

巴塞爾位於歐洲的中心，三個國家於此中心處接壤，劃分瑞士和德國邊界的萊因河(Rhine)到此轉向北方，隔開德國和法國。這是一個具有偉大的人文主義傳統的城市，神學家艾伊尼阿斯·西爾維烏(Aeneas Silvius，庇護二世的原名——中譯者註)、畫家孔拉德·威茲(Conrad Witz)都曾生活於此。瑞士第一所大學就在這兒建立。一五〇〇年前後，巴塞爾在商業上頗為重要，它在文化上也取得突出的地位，這得力於人本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印刷商約翰內斯·弗羅本(Johannes Froben)、地理學家西巴斯梯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伯努利氏(the Bernoullis)與列奧哈德·歐拉(Leonhard Euler)這樣一些數學家、畫家漢斯·小霍爾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等人。

10

布克哈特出世之時，巴塞爾是個在文化上充溢富足、自滿自足、極其保守的城市。

巴塞爾由貴族統治，他們倖免於法國大革命的平等思想的衝擊和拿破崙的征服，他們是由富有的牧師和學者這些特權階層人物組成。布克哈特的先人中有許多就是牧師和教授。他的父親是一個牧師，任職的大教堂奠基於一〇一九年，它融合古羅馬和哥德式的建築風格，十五世紀時普世教會(Ecumenical Council)曾在此接待皇帝、教皇，以及其他高貴人士。甚至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也未能將這城市推向變革。它毫不動搖，依然是那種貴族式的。直到一八七五年，即瑞士鞏固了它的全國性的民主政府後一年，巴塞爾才通過了一個民主憲法。

布克哈特在這樣的正統喀爾文主義(Calvinist)的和保守的環境中差不多生活了一生。他的中學教育，有幾個月在瑞士法語地區度過，因此有了「第二精神故鄉」，他還在德國學了幾年。他曾到義大利旅遊過幾次，到過奧地利、英國和法國，以擺脫家鄉11 的偏狹。然而，他依然為自己是一個巴塞爾的兒子及其大學的一員而自豪。這種自豪感如此強烈，以至於他謝絕列奧波爾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提供的柏林大學的教席，因為在別的地方教書，就將是「巴塞爾之賊」。對於他來說，巴塞爾的人文主義傳統與保守的生活方式與他自己的觀點是相一致的，雖然他有時也對其極為不滿。埃米爾·沃爾特·澤登(Emil Walter Zeeden)寫道：在早年布克哈特身上可以看到開明保守主義(enlightened conservatism)，他對保守主義的強調與年齡一起增長。

顯然是想要追隨他父親的步趨，布克哈特先是於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九年間在巴塞爾學習新教神學。然後，他在柏林和波恩的大學中，師從蘭克(Ranke)、雅各布·格雷姆(Jacob Grimm)、奧古斯特·波埃克(August Boeckh)，和法蘭茲·庫格勒(Franz Kugler)，轉而學習歷史和藝術史。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五年間，

他任教於巴塞爾，其間因有幾次赴國外（主要是到義大利和柏林）訪問研究而中斷，一八五五年他成為蘇黎士工藝學院藝術史教授，三年後出任巴塞爾大學歷史學及藝術史教授，並在這裡執教到去世為止。他自詡道，在巴塞爾教書的歲月中，他從未缺過一次課。很顯然，他一定是熱愛此項工作的。

布克哈特花費大量的時間與他的學生們在一起。他與他們一起散步，或是邀請其中某人在九點左右他結束工作以後到麵包師傅房子裡他的住處，與他一起度過夜晚。受人羨慕的被邀請者在這個家具擺設很少，可以眺望萊因河的房間裡，在燭光下，進行令人陶醉的交談，還小酌數杯，吃些點心，直到午夜，離開時仍然興致盎然，十分興奮。布克哈特在十二歲失去母親以後，開始認識到世上的事情變幻無常，一種想遺身物外的感覺支配了他，12 並伴隨他終身。做為這種感覺的彌補，他欣賞各種形式的美，並為他的同胞做好事。他稱悲觀主義者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為真正的哲學家，他總是尋求慰藉，試圖安慰、激勵他人——他的聽眾、他要幫助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以及他的著作的讀者。

布克哈特的第一本著作是《君士坦丁大帝時代》(*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1853)，論述古代的衰落，說明基督教的勝利以及向中世紀的過渡。此後的幾本書顯然是由他對美的渴求激發而寫成。《導遊》(*Cicerone*, 1855)描述觀賞義大利藝術寶藏的過程，表現了一種非凡的藝術鑑賞力，它在今天與寫它時一樣具有指導價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60)表明，與中世紀社會的一體性(corporate nature)成為截然對照，古代人文主義的復興是重新認識個人主義的結果，這導致文藝復興時期美的創造。《文藝復興史》(*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1867)討論了建築風格。在他生命的餘下時間內，他再也沒有出版過一行字。

他在五十歲不到時就停止出書，他出版的東西以論述藝術做為終結，這表明他希望與他的同胞共同享受美，使他們避向歌德(Goethe)曾描寫過的美的王國，布克哈特對歌德很欽佩。因為，

- 13 布克哈特從他的「事件之外的阿基米德點」(Archimedean point outside events)、從中立的瑞士的文化之都[有一個時期巴霍芬(Bachofen)、波克林(Böcklin)，尼采(Nietzsche)、及歐沃貝克(Overbeck)與布克哈特都在巴塞爾]來看，他擔心，整個歐洲的發展在許多方面令人不愉快，對於人類未來是不好的預兆，這是由於他感到全部歷史中靠個人獨創努力所獲得的那種文化受到了威脅。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他的歷史觀。論述這方面觀點的有《書信集》(*Letters*，在本世紀出版)、《歷史殘篇》(*Historical Fragments*，1929年出版)和《歷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History*)。《歷史的反思》是於一九〇五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書名是*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由布克哈特的侄子巴塞爾的雅各布·俄利(Jacob Oeri)編成，一九四一年布克哈特的後繼者、巴塞爾大學歷史學教授瓦爾納·卡基(Werner Kagi)對它做了修訂和擴充。

這本《歷史的反思》是一九四三年在倫敦第一次出版的英譯本的再版，它是布克哈特著作中最有名的一本，它對布克哈特的歷史觀做了最廣泛的論述。它原是草稿，或者是說在巴塞爾教書的講稿。第一到第四章反映了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八五年間斷斷續續進行的教學過程，還包括更早一些時期的教學內容：〈歷史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第五章來自一八七〇年在巴塞爾博物館所做的三次當眾演講，題為〈歷史上的偉大人物〉(The Great Men of History)。第六章是在那兒

* 德文，意即「歷史的反思」。——中譯者。

所做的單次演講〈論歷史中的幸運與不幸〉(On Fortune and Misfortune in History)。布克哈特並不希望將這些演講出版。然而還是從他那兒獲得出版它們的許可，那是他實際上已到臨終之時。如果他拒絕，那將是多麼不幸啊！尼采曾在一八六九年二十四歲時以經典著作的教授身分來到巴塞爾，與布克哈特建立了友誼，一八七〇年還聽過他的課。尼采大約是「理解他的思想的深刻涵義及其劇變和轉折」②的少數聽眾中的一個。他還從布克哈特身上看到了這樣一個歷史學家：「他不為普遍的幻想所支配，敢於正視事實」③。

布克哈特儘管是個保守主義者，他仍然是個第一流的創新者。做為一個藝術史專家，他超越單純的藝術家的歷史，建立了系統的藝術史學。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引進了寫歷史的新方法。他注意的主要不是形成過程，而是已經產生，並且「經常、反覆出現的，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與流行的政治歷史著作相反，他寧願展示歷史的橫斷面。正如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所指出的，布克哈特大概是十九世紀偉大歷史學家中唯一採取靜力學的(static)，而不是發生學的(genetic)人類歷史觀的人④。他對歷史生活變動不定的畫面的興趣，遠小於對大潮流和典型特徵的興趣。他拒絕他那個時代的實證主義，強調「關於事實的專門知識，除了做為特定領域的知識或思想這種價值以外，還具有一種普遍的或歷史的價值，因為它能映照人的多變精神的一個側面，如若置於確當的聯繫之中，它同時還顯示精神的連續性和永恆性」⑤。他不僅蒐集事實，而且選擇那些在他看來是重要的事實，以便去考察人的多變精神的相關方面。

開宗明義，在做為〈導論〉的那一章中，布克哈特寫道：他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其性質是病理學的」。他先是描述了從古代經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歐洲文明，在強調了它所有的成就和美好事物之後，他就如卡西勒所說，成了這一文明的病理學家。

他以為，他再也不能用美好的事物鼓舞他的讀者，這能夠很好地解釋為什麼他不願將他對世界歷史的反思出版。正像英譯者所指出的，布克哈特在一八六六年寫道，講稿只能做為講稿而再次獲得生命，它們如果付梓將被證明是極為不妥的，就像地毯的內裡不能面朝外放。他希望把他所揭示的歐洲文明所面臨的挑戰告之有限的聽眾，而不是廣大的讀者；這很像一個醫生，可能會將病情告訴病人及其親屬，而不會告訴一般公眾。他的態度與醫生的相同，是以人為本位。他承認從宗教的立場來看，歷史有其特殊的權利，然而，他對「別的世界力量可能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來解釋和利用歷史；例如，社會主義，以及它掌握群眾的歷史」表示了懷疑。他將自己的態度與之相對照：「然而，我們將從易於為我們所理解的一點出發，這就是所有事物的永恆中心——人，即現在、過去，以及以後將永遠遭受磨難，努力奮鬥、工作的人」。

16 對於布克哈特來說，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布克哈特是自由之友和權力的懷疑主義者。《歷史的反思》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暴力(force)、強權(might)，或曰權力(power)，不論人們如何表達 Macht (德語，意為權力、力量——譯者)，其本身就是，或者說必然是，或者說顧名思義是「不論人們如何表達 an sich (德語，意為本身——譯者)」邪惡的。如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指出，這句話意思含糊。它肯定不像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下述名言那樣明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然而布克哈特也使人毫不懷疑，Macht 更可能被濫用而有害，而被很好地利用的可能性並不大。

布克哈特向人們表明，他在根本上不同意黑格爾(Hegel)以整個歷史進程為理性向著完全的自由前進的觀點。他認為，「我們與永恆智慧的目的無關：它們超越於我們的認識範圍以外」。他也不相信文明會不可避免地衰落。他還非議黑格爾向國家獻媚。對於黑格爾來說，國家體現了歷史、道德秩序、正義，和自由的

實現。它是關於塵世的神聖觀念的表現，像人們常說的，是上帝在人世間的行進。黑格爾因為在國家中看到合乎倫理的制度而頌揚它，布克哈特棄絕這種美化，認為它是一種盲目崇拜。布克哈特相信，宗教與文化在賦予個體以精神實體(spiritual reality)這一方面也可以起作用。國家不是萬能的，而是在宗教和文化之後，成為構成歷史過程的三個相互依存的、互補的力量之一。

在布克哈特的時代，即立憲主義時代，國家不再是專制主義時代曾經是的那種極權主義怪物。爭取建立立憲政府、建立一個最少控制的政府的運動，受到英國、美國、法國的革命和放任主義學說的推動，這一運動造成對於國家權力的限制。然而布克哈特並沒有忽視政府權力的罪惡，他以為這種權力威脅文化——人類的藝術、經濟、道德、政治、宗教和社會的創造活動的精華。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然而，在毀滅它時，也常常同樣是如此。布克哈特援引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國家做為近代國家第一個最好範例，它對文化差不多所有方面都施加了最大的強制力量，表現為「一個令人沮喪的、純粹的權力獨享者，一種依靠自身，並且為了自身而存在的假機體(pseudo-organism)」。¹⁷這種國家違背「普遍真理」，危害宗教與文化。它的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取消南特敕令和對胡格諾派(Huguenots)的大驅逐，根據布克哈特的看法，這是人類貢獻給名曰「統一」的莫洛克神*和皇家權力觀念從未有過的最大犧牲。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受到迫害，並且處心積慮地剝奪那些尚未受到迫害的人的任何精神自由。知識界迎合國家權力。政權無法用暴力獲得的東西，知識界慷慨地給予，以圖蒙受浩蕩皇恩。科學院也屈從於國家權力。「文學，甚至哲學，莫不奴顏婢膝地頌揚國家，而藝術更是如此；它們只是創作宮廷可以接受的東西。知識界努力討好宮廷

*莫洛克神(Moloch)，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兒童做為獻祭品，象徵著犧牲人命的恐怖事物——譯者。

方面，在習俗面前卑躬屈膝。說到在這種追逐私利的風氣下的創造活動，那麼表達自由只能在流放者中或還可在民間藝人中找到」。在布克哈特看來，每一個強大國家都建立於暴力和罪惡之上。

路易十四及其繼位者的專制主義的壽終正寢，一點也沒有改變布克哈特根深柢固的懷疑主義。有趣的是，他的「權力本性是惡」的名言是在他與以下這種「很吸引人的樂觀主義觀點」的爭論中所產生：這種觀點以為國家是社會的保護者、管理者、防禦者，一種像在歐洲大陸上對自由主義國家所說的「守夜人國家」。每一個國家，甚至那種被設計成保護個人自由的國家，都擁有惡魔似的力量。這些力量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無論是像通過德國統一，還是由於法國大革命的激發，都是如此。

儘管布克哈特把德國視為他的精神祖國，早就懂得德國人要統一的願望，但是他心目中的德國是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康德(Kant)、洪堡特(Humboldt)的德國，而不是俾斯麥(Bismarck)的德國，是文學和哲學繁榮，而不是軍國主義膨脹的德國。他心目中的德國是由政治上無關緊要的邦國所組成。與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卡爾·馮·羅太克(Karl von Rotteck)一樣，他寧願要沒有統一的自由，而不要沒有自由的統一。布克哈特早年在巴塞爾就曾經反對中央政府侵犯州的權利，他把爭取建立巨大的民族國家的運動，看成是對更高程度的文化和個人自由的威脅。他坦率地表示對德國統一的懷疑主義態度。普法戰爭爆發後，他在寫給朋友弗雷德里希·馮·普林(Friedrich von Preen)的信中表達了他的憂慮：既然德國人已經以政治為根本，將來也會這樣做；有學問的上層人士現在為普魯士的力量而歡欣鼓舞，一八七〇年以後如出現精神貧乏，粗野又會重現⑤。

因此，布克哈特對統一後德國的看法與亨利希·馮·特萊茨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相似，後者寫的一句話表達了

許多德國人的看法：「國家的本質首先是權力，其次是權力，再次還是權力」。特萊茨克是支持俾斯麥的民族自由黨的成員，而布克哈特是自由個人主義者，兩人之間的差別在於，特萊茨克期望一個強大的德意志，希望它是黑格爾主義國家的實現，而布克哈特認為這樣的德國有害於自由與文化。布克哈特對統一的義大利也表示了類似的擔憂。

布克哈特對法國大革命釋放出來的力量同樣持懷疑態度。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革命增強了中央集權的力量，但是這不是他批判它的唯一原因。康德提到的一個事件，人們是絕不會忘記的：法國大革命用這樣的觀念取代了神聖的王權：人民的聲音即上帝的聲音，它將絕對的權力從國王轉移到人民及其多數派手中。我們知道，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當他在其《佛吉尼亞紀事》(*Notes on Virginia*)中說一百七十三個暴君與一個暴君的暴虐肯定是一樣的時候他是如何想的。布克哈特的疑慮並不更

20

少。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促進了以下這樣一些觀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和政治平等，產業自由，不動產轉移的自由等。但是他平衡地譴責說，總的來看，它是許多罪惡的來源。對於他來說，法國大革命看起來基本上是像森林大火，難以擺脫：它將蔓延，毀滅價值。

這種破壞性力量是布克哈特所說的革命主要弊端——「賦與無窮無盡的改正以正當性」本身所固有的。革命所造成的決定性的創新是「為了公共福利而允許變革和希望變革」⑥。這一點又為法國大革命的新內涵——人民主權(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推向前進。布克哈特讚許地引述他的老師蘭克的話說，從來沒有一種政治觀念像人民主權論那樣，在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產生這樣深刻的影響。它有時受到壓制，只是對意見起作用，然後再度突然走向公眾，被公開奉行，從未實現，無止境的介入，它永遠是近代社會的興奮劑。結果是，正當性(legiti-

macy) 逐漸被涵義越來越模糊的合法性(legality)所取代。在法國大革命後名副其實的立法熱中，一些已被證明有其價值的、穩定的、較舊的法律，根據立法程序被取代了。立法常常是由完善事物的正當願望所引起，然而更多的是反映變了樣的願望，即為變革而變革。這種通過法律所做的無窮盡的變革，結果是對於社會和組成它的個體的日益增強的控制和管轄。布克哈特注意到，在法國大革命時，由集會和代表大會支配的政府是如何被拿破崙一世的一人統治所替代的，他確信，這種盧梭—拿破崙模式(Rousseauistic-Napoleonic pattern)在其他歐洲國家也將會做為民主進程的結果而出現。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民主遲早會著迷於「可怕的簡化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他們將橫行於我們古老的歐洲」，並且在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建立獨裁和軍事統治。

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統治者也要求變革。處於法國大革命後的民主潮流之中，面對著人們的自然能力和特長方面的差別總是會重新導致不平等這樣的事實，為了平等的目的，每天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採取新的措施。這意味著平等總是處於不斷地征服自由之中，儘管「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將自由置於平等之前。用法律製造平等(equality through the law)將取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

身處於平等主義的民主進程的終結之時，布克哈特確實將幫助貧窮、痛苦的人民視為他個人的責任，但他預見到了社會主義，看出它的所有危險和後果。在給赫爾曼·紹恩堡(Hermann Schauenburg)的信中，他擔心「社會的最後審判」正在到來；他警告「社會革命」的「普遍野蠻狀態」，並且譴責「藉口教育是必須加以摧毀的資本主義的秘密同盟而對精神實行專制」^⑦。當人們的其他權利都被利用了以後，「妒忌」和「貪婪」將提出反對私有財產的權利。沒收充公將成為合法：「我對來自於逐漸增多的社

會主義立法的弊端的擔憂，甚於對突然襲擊而來的罪行的恐懼」。在寫於一八九一年的一封信中，他擔憂社會主義者不瞭解世俗慾望的虛妄，認為他們「極其危險，因為他們過於樂觀，頭腦狹隘，大張其口」。群眾無窮無盡的要求將會向國家提出。布克哈特在他的《歷史殘篇》(*Historical Fragments*)中表達了這樣的憂慮：「社會(das Soziale)將會賦予國家以聞所未聞的、橫暴的任務，要完成它們只能靠那種聞所未聞、橫暴的巨大權力」。群眾的社會主義慾望的另一個結果，將會是降低政治領導標準。正如詹姆斯·哈斯廷斯·尼科爾斯(James Hastings Nichols)所強調的，受過教育的、遵奉傳統的、有個性的人，將要受到反傳統的、無根的群眾的猜疑和仇視，這些群眾追隨同樣平庸、向人們許諾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煽動者，力圖改善他們的命運。又如海耶克(F. A. Hayek)後來所說，在社會主義名義下，最差的居先。布克哈特擔心，道德敗壞的野心家成為典型的社會主義領袖，他們將變成新的凱撒(Caesar)。為了社會福利而不斷加強國家權力以及新凱撒的出現，將會日益減少個人的自由，直至社會變成一個奴役國家。與尼采一樣，對於布克哈特來說，社會主義是專制政治的「兄弟」。早在一八四九年布克哈特在給赫爾曼·紹恩堡的信中就曾寫道，他「認為民主主義者和無產者肯定將不得不給最嚴厲的專制政治留下地盤，儘管他們可能會狂熱地試圖防止它」^⑧。一八八二年他給普林寫道「暫時人們可能還不願設想有這樣一個世界，它的統治者把法律、福利、獲利勞動和工業、信貸等變為抽象的東西，然後他們就能進行絕對殘暴的統治。然而，只要今日群眾參與政黨政策的制訂的競賽存在，世界就會落到這種人的掌握中」^⑨，他們擁有一切權力，對個人的權力只會做出很少的讓步。

在群眾時代，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社會主義、軍國主義，以及由這些產生的專制主義，將會導致文化的衰落。講究物質利益的實利主義將取代理想主義，標準

化將取代個人主義。戰爭將會發生。給布克哈特以很大震動的普法戰爭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更多的戰爭將會繼之而來。法國大革命的遺產固然是可怕的，當布克哈特在做《歷史的反思》的最後幾講時，他感覺到，最壞的尚未到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以後，在歐洲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他寫道，「這主要是因為到處都有那些誠實、卓越、豁達的人，他們並不十分瞭解是非的界限，並不十分瞭解該在什麼地方履行抵抗和守衛的職責。正是這些人爲到處都有的可怕的群眾敞開大門，鋪平道路。」標準的自由主義者老巴斯勒(Old Baseler)爲了文化而盡心竭力維護個人自由，他曾經指責自由主義夥伴中玩忽捍衛自由主義立憲秩序職守的人。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經寫道，布克哈特想要在傳統文化因素與新興力量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他以爲這種力量是民主政治的興起所激發出來的^⑩。這是對布克哈特很準確的描述，他是一個懂分寸的人，他以爲講分寸的個體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他既不同於祁克果(Kierkegaard)，又有別於黑格爾，他不喜歡華格納，因為後者在人身上發現的稟賦很少。《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書的作者(指尼采——中譯者)曾自吹他是唯一理解布克哈特講演的一個人，布克哈特被拿來與美國傑出的民主政治維護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相比，也可以把他與某些美國的奠基者，那些重視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的個人權利，並把民主看做是這些權利的威脅、信守中道的人士相比，以爲他們不能相比是沒有道理的。

尼布爾在評論《歷史的反思》時說，必須承認布克哈特對二十世紀有最爲準確的預見。

對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的預言，沒有人比他更準確的了。……

他相信，現代專制統治者將會使用甚至是過去最可怕的暴君也不忍心使用的方法。……布克哈特以相當的準確性預見到，極權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文化在多大程度上由於不能認識敵手而向專制主義投降。^⑪

對這段評論還可加進這樣的話：當今許多自由主義者認不出他們的敵手，看不出是非界限，不能認清捍衛自由主義秩序的責任。平均主義的民主主義自布克哈特之後已走了很遠，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如布克哈特所預想的，自由主義的任務很不輕鬆，然而那些與惡劣條件奮鬥的人的任務從來不是輕鬆的。儘管布克哈特有種種悲觀，他還是透過專制主義的重重雲層看到了光芒。這種光芒鼓舞人們去清除半文明的偽善，做一個苦行者和殉道者，結果是他內在的自主性使他勇於去獲取文化成就。

附 記

這個再版的英譯本最初是由喬治·艾倫與恩文股份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倫敦, 1943年)。譯者霍廷格(M. D. Hottinger)當時說：「這些講義只不過相當於一部完美的樂曲中的基礎低音，講義草稿中難以辨認和難以解釋之處比比皆是，即使在那些最瞭解布克哈特的人當中，解釋也因人而異。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或者給它們本來沒有的明澈，或者保留原樣。最後此書譯者選擇了第二種方法。譯者希望這個譯本能夠促使它的某些讀者去看原文，對於那些覺得原文難讀的人來說它或許能夠當做導讀。『一切榮譽歸於譯文』，雅各布·布克哈特在這本書中就是這樣說，『但是沒有什麼能代替原文』。翻譯、出

版此書並不是想要取代原文，而是想或許能導向原文」。

資料來源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著作以及以下第二手材料：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暴力與自由〉(Force and Freedom)，載於《美國學者 13》(*The American Scholar* 13) (1944)：407；埃米爾·迪爾(Emil Dürr)《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自由觀與權力觀》(*Freiheit und Macht bei Jacob Burckhardt*) (Basel, 1918)；瓦倫丁·吉特曼(Valentin Gittermann)《政治思想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als Politischer Denker*) (Wiesbaden, 1957)；卡爾·喬爾(Karl Joël)《歷史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als Geschichtsphilosoph*) (Basel, 1918)；辛利奇·尼特梅耶(Hinrich Knittermeyer)《雅各布·布克哈特》(Stuttgart, 1949)；卡爾·洛維斯(Karl Löwith)《雅各布·布克哈特》(Stuttgart, 1966)；詹姆士·尼科爾斯(James Hastings Nichols)《雅各布·布克哈特》，載於《暴力與自由：歷史的反思》(*Force and Freedom: Reflections on History*) (New York, 1943)；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做為預言家的歷史學家〉，載於《民族 156》(*The Nation* 156) (1943年)：530；埃米爾·澤登(Emil Walter Zeeden)〈布克哈特〉載於《政治學辭典 2》(*Staatslexikon* 2) (1958)。

戈特弗雷·狄慈
(Gottfried Dietze)

註釋

- ①根道爾夫(Friedrich Gundolf)：〈從赫德到布克哈特的德意志歷史學家〉(未出版的手稿) (*German Historians from Herder to Burckhardt*)的導言，轉引自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暴力與自由：評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英文版《歷史的反思》〉(Force and Freedom: Remarks on the English Edition of Jacob Burckhardt's 'Reflections on History')，載於《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13(1944)：417。
- ②尼采給卡爾·馮·格斯道夫(Carl von Gersdorff)的信，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七日，載於吉奧基奧·柯利與馬茲諾·蒙蒂納利(Giorgio Colli/Mazzino Montinari)所編《尼采通信集》(*Nietzsche Briefwechsel*) (Berlin, 1977)，2, I, 155
- ③同上。
- ④卡西勒：〈暴力與自由〉，《美國學者》13(1944)：407。
- ⑤〈布克哈特通信集〉，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Briefe*, Leipzig, 1935)，p.344 ff。
- ⑥《歷史殘篇》(*Historische Fragmente*)，(Stuttgart and Berlin, 1942)：205。
- ⑦〈布克哈特通信集〉，一八四六年三月五日，p.148。
- ⑧〈布爾雅特通信集〉，一八四九年九月十四日前，p.185。
- ⑨〈布克哈特通信集〉，4月13日。p.451。
- ⑩尼布爾〈做為預言家的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 as Prophet*)，載於《民族》(*The Nation*)156(1943)，p.530。
- ⑪尼布爾〈做為預言家的歷史學家〉，載於《民族》156(1943)，p.531。